



刘示范：“普世伦理”的重要思想资源——《论语》的道德哲学
(2006-1-23 11:19:05)

作者：刘示范

，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论语·子路篇》也记载说：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朱熹为此注云：

苏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则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劳之，则虽动不怨。”

杨伯峻先生的译文更为清楚。他说：

子路问政治。孔子道：“自己给百姓带头，然后让他们勤劳地工作。”子路请求多讲一点。孔子又道：“永远不要懈怠。”杨先生抓住了这句话的实质：“自己给老百姓带头”，“永远不要懈怠”。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杨伯峻先生对这一段文字的翻译是：

“孔子说：统治者本身行为正当，不发命令，事情也行得通。他本身行为不正当，纵三令五申，百姓也不会信从。”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康有为在他的《论语注》一书中对此处的注是：

“苟，诚也。言从政者当先正身。正一身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一正而无不正，一不正而无能正也。”

当政者自身的“正”至关重要。诚如通常所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这种道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只要有“政”存在，它就是常青的。孰能说“非”！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统治者如果以身作则，实行“仁政”，就会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就会“来远附迩”，国泰民安。从政者的道德内容宏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政者，正也”。这是“官箴”之根本。今天的“普世伦理”对上述观点既不能置之不理，也不能说“否”！

（五）、“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应是“普世伦理”的师德之魂

教育和人才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生命线。这已经是全世界公认的不争的事实。教育的关键是“教师”，教师必须“德”“才”兼备。“师德”当是今天讨论的“普世伦理”不能回避的重要内容。孔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之中积累了丰富的深刻而深刻的教育经验，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师德”内容，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则是《论语》书中所讲“师德”的主要内容，这也是“师德”之魂。作为一位老师，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不论在大学，还是在幼儿园，他们的知识准备永远是不能满足客观需要的，因此，他们永远需要孜孜不倦地学习新的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职业道德水平；同时，作为一位老师，他所对着的学生又是千差万别的，老师为了将这些学生教育好，就必须具有“诲人不倦”的精神，唯有如此才能收到比较理想的效果。孔子在教育实践中提炼出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实为人类“师德”之精华，是孔子一生教育经验之结晶。

“学而不厌”。孔子虽然自幼家贫，但是，这丝毫没有磨灭他好学的锐气，相反，他穷且志坚；孔子的人生路上虽然荆棘丛生，但是，他在困难中愈挫愈奋。他虚心好学，“学而不厌”。《论语·述而篇》记载：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论语·子罕篇》又载：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论语·为政篇》记载：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以上文字说明，孔子终生好学，“学而不厌”。孔子作为一位老师，他不但好学，而且还爱教、善教，“诲人不倦”。

《论语·述而篇》有两处记载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文字。这两处都是讲：孔子虽然已经同时具备了这两种高尚师德，但是，他自己仍然觉得不满足。《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也有文字说：

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

矣！”

因为孔子具有高尚师德和丰厚的文化基础，又有科学的教育方法，所以他能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培养出弟子三千，而贤者七十有二人。他的大多数弟子，不仅事业上成就显赫，而且德行也高尚，铭记老师的培育之恩。在孔子去世之后，学生们自愿主动为孔子“守庐”三年，子贡还单独又守三年，他为老师守庐共计长达六年之久。这是孔子的高尚师德在学生身上的反映。

孔子创立并留给我们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师德规范与原则，经久弥新，是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和发扬的。也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普世伦理”，应当积极面对的重要思想资源。

（六）、“重大节而不羞小辱”应是“普世伦理”道德评价的根本指导思想

道德评价问题，既是所有道德哲学必须阐发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一切道德哲学都必须回答的重要实践问题。这也是“普世伦理”不能回避而必须做出肯定回答的重要问题。《论语》的道德哲学中，道德评价的根本标准与根本指导思想是注重抓主要矛盾，即“重大节而不羞小辱”。这个特点突出表现为孔子对管仲的评价。《论语·八佾篇》记载孔子在评价管仲时，曾经批评“管仲之器小哉”！管仲“不知礼”等等。如：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以上文字主要是批评管仲：器量狭小得很；不节俭；不知礼，等。

但是，《论语·宪问篇》记载，孔子与学生子路、子贡讨论管仲是仁，还是不仁。孔子却从政治的角度，高度热情地颂扬了管仲的历史贡献：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起，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另一段文字，是孔子回答子贡对管仲的有关批评：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起，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孔子对管仲进行道德评价时，首先将管仲客观地放到一个政治家、辅佐一国之君的“相”的位置上，然后对他进行认真的、全面的、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孔子对作为“相”的管仲所承担的历史任务以及管仲实际完成任务的情况，进行了客观、公正的仔细分析，在此基础上，抓住主要矛盾，即规定“相”的“质”的主要要素和管仲的主要贡献，明确地给出了“如其仁”！“如其仁”的高度评价。这是公正的、科学的！

进行道德评价，最基本的要求，应当是首先弄清被评价对象的特殊的“质”，同时弄清该评价对象所应当承担的道德义务以及该对象完成这些道德义务的情况，然后准确地抓住主要矛盾，大胆给出符合实际的科学评价。孔子所运用的这种道德评价的标准和基本指导思想与方法，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的指导作用，是“普世伦理”最现实、最直接的思想资源，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普世伦理”在向我们挑战

今天，世界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以前所没有的迅猛不及掩耳的速度发展。真乃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现在，国人不再觉得世界是可望不可及的“未知数”，而是普遍认为“世界就在我的面前”，我也属于世界的，我就是世界的。“普世伦理”对于中国人还十分遥远吗？“否！”“普世伦理”早已紧叩我们的国门！“普世伦理”在向我们挑战。迎接这种挑战并争取主动与胜利，我们需要做和能够做的事情很多、很多，但是，实事求是、虚心、冷静地思考万千，结论似乎是：

今天，应当是我们正确认识与对待孔子与孔子思想的时候了。

早在汉朝时，大思想家太史公到山东的鲁国考察之后就发表感慨说：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

从孔子到《史记》成书之时，相距约“十余世”，其间众多的“君王”“贤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当时则荣”，“没则已焉”！用今天的白话说就是：他们在台上、掌权时“则荣”（“当时则荣”）；一旦下了台、不掌权了“则已焉”（“没则已焉”），不掌权了，也就完了。惟有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学，中间虽然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革命”之举，但是，孔子及儒学，仍然“学者宗之”，并且“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史记、索隐》：“王师叔云‘折中，正也’。”）惟有孔子对“六艺”的理解是正确而科学的，即“六艺”的标准答案就在孔子那里。这是连那“十余世”的“天子王侯”都已公认的事实！真“可谓至圣矣”！

到了宋朝，又出了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警世之论。

当今，中国共产党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最能科学地对待历史及历史人物。毛泽东同志早就说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第 4 页\]](#)

[\[关闭窗口\]](#)